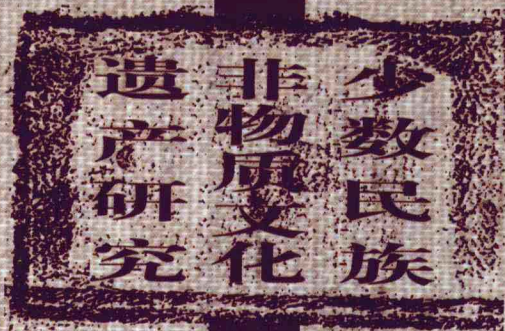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

A Study on Ethnic Minoriti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from "Dage" of Yi People in Weishan of Yunnan

安学斌 著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

A Study on Ethnic Minoriti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from “Dage” of Yi People in Weishan of Yunnan

安学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
安学斌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9542 - 1

I. 少… II. 安… III. 彝族—民歌—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云南省 IV. J607.217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2033 号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mzcbs. com](http://www.mzcbs.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370 千字

印 张：20.875

印 数：0001 - 1500 册

定 价：3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542 - 1/J · 586 (汉 28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图1 青海省大通县上
孙家寨出土的彩陶盆



图2 （宋）马远《踏歌图》



图3 《南诏图传》局部



图4 《南诏图传》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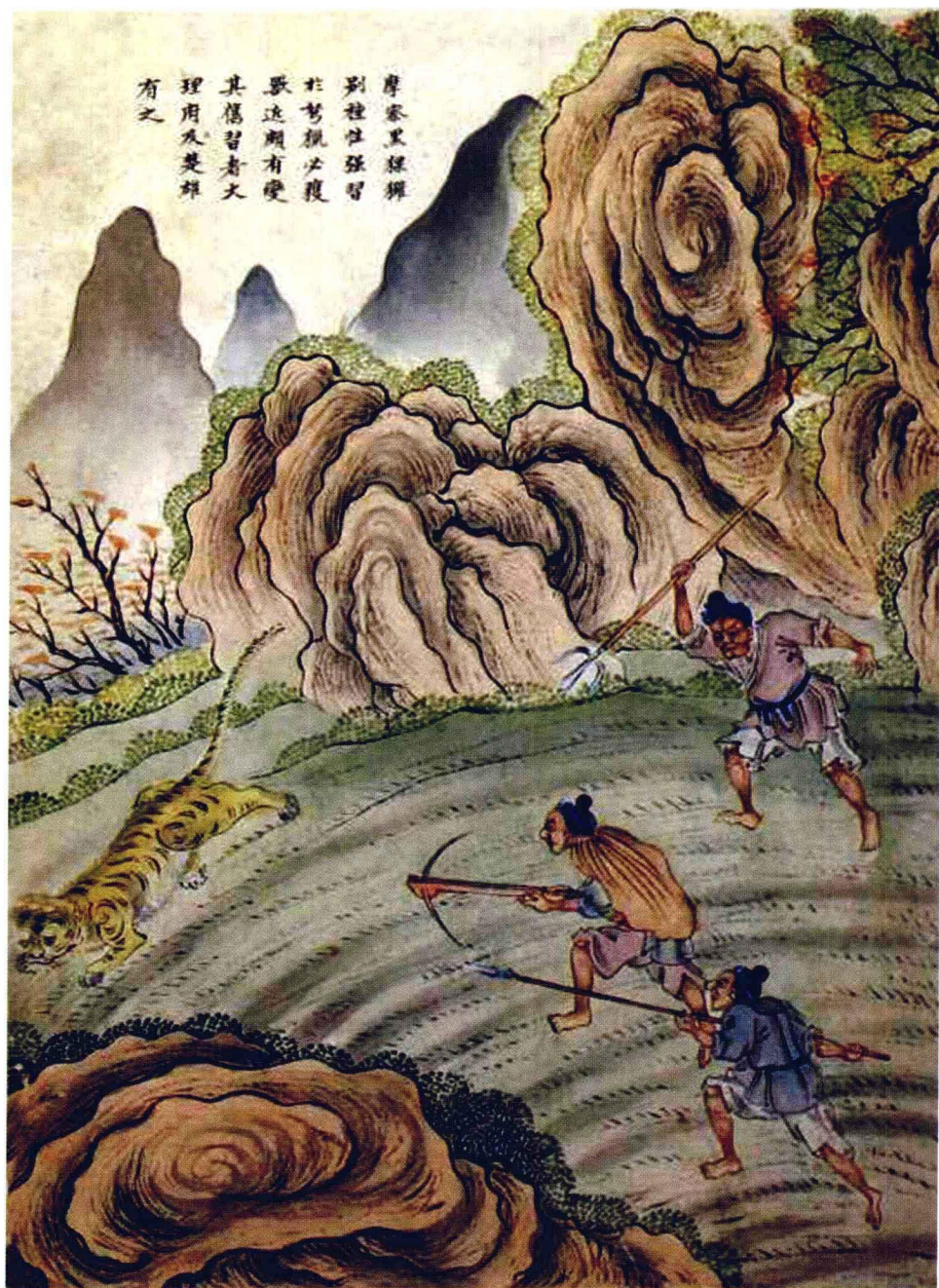


图5 摩擦



图6 麦岔



图7 蒙化夷



图8 巍宝山龙潭殿《巍山彝族松下踏歌图》

图9 巍山彝族打歌队昆明合影



国際交流基金設立15周年記念
第5回アジア伝統芸能の交流「アジアの神・舞・歌」 於：国立劇場大劇場
1987年9月9日～12日

图10 巍山彝族农民打歌队1987年赴日本参加第五界东南亚民族文化艺术节合影



图11 巍山彝族打歌队参加大理
白族自治州文艺汇演合影



图12 巍山彝族
打歌队武汉合影



图 13 古城打歌



图 14 学打歌的彝族儿童



图 15 “芦笙一响脚杆就痒，笛子一吹调子就飞”



图 16 “打歌打得星星落，只见黄灰不见脚”

序

2004年，安学斌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研究方向是民族文化遗产。学斌是云南省宾川县的彝族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步入民族研究行列，来我们门下时已具副教授职称。他入学后，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博士学位的选题方向。

自2003年起，中华大地卷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我招收“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的基本意图是从文化多样性理念出发，注重“工作性”，培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用之材。有的学者提出“遗产学”与“遗产运动”的分野，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被打上强烈的现代烙印，它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是一个社会实践，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产物。”“遗产学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即便是讨论纯粹的学理问题也需强调这一点。对遗产的保护更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专业性的系统工程。”^①我个人以为，“遗产学”生成于“遗产运动”，没有“遗产学”的“运动”是盲目的，没有“遗产运动”的“学”是空洞的。“遗产学”和“遗产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者的“文本间性”无法割裂。我还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有了遗产运动，必然出现遗产的学问，离开“遗产运动”的“遗产学”是子虚乌有的。在“遗产运动”的过程中，遗产学的学问，也就是“遗产学”必然应运而生。在学界潜在一种看法，认为“遗产学”不是“纯正学问”，以“遗产运动”为“不是东西”，不过是玩弄花架子的唬人把戏而已。西方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有一句名言：“Zu den Sachen Selbst（直面于事情本身）”，有人翻译成“回到事物本身”。遗产的学问，当然出自“文化遗产”（the cultural heritage）。我们要弄明白“遗产学”，必须首先回到“文化遗产”本身。

① 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载《文艺研究》，2008（2）：84-91。



从语言学角度,“文化遗产”一词源于何时何处,笔者没有考究。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化遗产”是现代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是被“运动”出来的。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重视。既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自20世纪70年代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UNESCO)就把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自此,全球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从多元文化视野出发,继承和保护世界各地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基本目标。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这个公约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作出明确规定,规定被评选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任何一项遗产,不仅属于评选国,也属于人类共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自然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组成的自然面貌、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境区、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区域等。

但是,这个公约不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获得通过之后,一部分会员国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订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各个方面的国际标准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11月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书》,在1997年11月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这个决议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遗产优秀作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4次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该执委会在第155次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的评审规则。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0年6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委会议,正式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巴黎)



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正是全球范围的遗产保护运动,促使文化遗产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的新学科。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的形式,经过一定的程序确认的全球性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大类型。目前,中国已有35项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仅有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丽江古城、高句丽遗址3项,自然遗产中,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自然景观等两项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有4项,属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是在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过程中逐渐开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之际,中国还热衷于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大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价值,1987年,长城、故宫等6项不可移动文物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时,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真正冲破“四旧”的束缚。贵州省文化工作者在全国率先迈开宣传、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步伐,1985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以“拦路酒”拉开大幕的《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产生轰动效应,紧接着,贵州节日文化、贵州苗族风情、贵州蜡染文化、贵州酒文化、贵州铜仁地区傩文化等展览相继来京登场,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与喝彩。然而,指责声也随之而起。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曾有人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置之脑后,甚至把它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迷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迷人的,在今日如火如荼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这话会被大多数人认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可不是社会的共识。1987年,上海的一家大报发表了一位“有经济头脑的人士”的一篇文章,题曰《迷人的陷阱》,文中对贵州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侗族的“鼓楼”以及其他民族的“蜡染”、“节日文化”等,嗤之以鼻,统统视为“陷阱”,对于“民族文化的挖掘、宣传、保护工作每年也都搞得轰轰烈烈”颇为愤懑,横加指责。对于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重估,经历过一个意义解读的历史过程。应当看到,正是无数不计名利、踏实苦干的基层



文化工作者艰辛“工作”，为推动全社会认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立下汗马功劳。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斐然的运动，也就谈不上“遗产的学问”。

世纪之交，中国大地上真正出现了可以载入史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个运动，以2001年昆曲艺术进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象征性发端。2003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3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2005年6月，国家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2005年6月20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42号），文件中明确界定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相提并论，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同等重要性。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2006年6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当选由18个委员国组成的首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成员。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性。2008年1月，文化部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2001年至今短短7年时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全民参与，由局部、零散、自发的状态步入全面、规范、有序的轨道，在普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举世瞩目，其中“政府主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学、有序展开的基本保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运动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应运而起，2006年10月，王文章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问世，标志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已经起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既有学问，也有理论。这个学问和理论，离不开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全民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就是我



对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再三强调的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问必须注重“工作性”的根由。学斌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正是以遗产学与遗产运动的“同一性”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实践，确定了《巍山彝族打歌研究》这一课题。

巍山旧称蒙化，是南诏故地、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彝族腊罗巴（又称腊鲁泼、腊鲁巴）支系，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前，被称为“土家”、“蒙化夷”。这一支系又有“密撒巴”的自称。在当地彝语中，“巴”、“泼”皆含“人”之意。“密撒”是地名，即蒙化。“密撒巴”原意是指“蒙化坝子居住的人”，在巍山境外，则指“从蒙化来的人”。“密撒”实即唐代“蒙舍”的对音，证明今日巍山彝族是蒙舍川的古老的世居民族，他们的先民是唐代南诏王室的主体民族。

1980年，我第一次到云南省实地调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踏上巍山寻找南诏历史足迹。那年春夏之交，在如诗如画的大理洱海湖畔，我第一次观看到大理白族自治州民间文艺调演中的巍山县马鞍山彝族打歌表演，那欢快、热烈的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时间和日程安排，此行没有进入巍山彝族打歌之乡。然而，巍山彝族打歌情结，却一直萦绕心头。回到北京后，1981年我写了一篇《打歌踏歌考略》，发表在《民族文化》上。当时对彝族打歌只有感觉，没有真正的了解，写这篇文章就是想从民族学事象中找寻南诏历史的影子。

1984年，我带一名硕士生实习，住进巍山古城，登临巍宝山之巅，在巍宝山文龙亭，我用当时仅有的120相机拍摄了那幅著名的清代打歌图壁画。步行一天，爬山越岭，进入马鞍山公社（今称乡）青云大队（今称村），实地调查青云彝族打歌。在青云，围绕山巅熊熊篝火，我用当时不多见的“砖块式”手携录音机录下那节奏鲜明的打歌调。身在其中，我感受到古老的南诏文化遗韵在这片外人很少涉足的高山溪水中流淌，我努力从巍山彝族打歌中捕捉逝去的南诏文化影像。其后，我和李昆声先生合作写了《南诏史话》，把巍山彝族打歌追溯为南诏音乐舞蹈的遗脉。我还写了一篇《南诏王室族属考辨》的论文，也是痴情不改，再一次表述自称“腊罗巴”的巍山彝族与南诏时代蒙舍蛮有着割不断的继承关系。现在反思，我当时关注巍山彝族打歌，意义在于“历史”，还不是“遗产”。

2005年，学斌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时，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评审时，我发现云南省申报的项目中没有“打



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有关彝族打歌的论文和著作，人们对于打歌的认识和了解已经加深。巍山彝族打歌没有申报国家级名录，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断裂，不再传承？还是由于申报工作没有做好？这使我感到困惑。带着这个疑问，作为彝族中的一员，学斌去巍山作了一番认真的调查，结果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巍山彝族打歌依然活跃在南诏故地；忧的是打歌传承面临困境，作为一种有宝贵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远未被完全理解。学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保护工作的规则，认识到对于巍山彝族打歌需要进行“价值重估”，这就是他选择撰写以巍山彝族打歌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缘故。从历史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转换，是意义的升华。

学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巍山彝族打歌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而又艰苦的实地调查。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斌自己驾车多次往返于昆明与巍山，对县、乡、村的官员以及文化工作者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访谈；他深入到每一个打歌社区、村落，了解、观察、记录各种打歌的活动和内容；他登门拜访巍山知名的打歌能手，获得了大量口述史记录。通过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学斌把握了巍山彝族打歌历史和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阐释理论，对巍山彝族打歌作出全新的解读，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其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评委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本书是学斌在他的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他写道：“巍山彝族打歌的典型性与杰出性，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完整的结构、丰厚的内涵、多重的功能和珍贵的价值等。从区域类型上说，有东山打歌、马鞍山打歌、五印打歌、青华打歌、巍宝山打歌、西山打歌等类型；从形态类型上，可分为节庆打歌、祭祀打歌、庙会打歌、家庭喜事打歌、丧葬打歌等类型；而从本体结构上看，打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音乐、歌词、舞蹈较为成熟完善，形成固定的形式，并不断创新变化。因而，巍山彝族打歌具有历史文化的反映性与传承性、地域性、民族性、艺术性、活态的流变性等特征，具有传承传播、教化、聚合、娱乐、审美等多重功能和艺术、科学研究、族群认同、旅游资源等重要价值。”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出发，发现巍山彝族打歌的突出价值，明确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要现实意义，是本书开拓性的贡献。

巍山彝族打歌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